

出土文献与
先秦文学批评思想研究

谭德兴
著

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批评思想研究

谭德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批评思想研究 / 谭德兴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010 - 5155 - 7

I. ①出… II. ①谭…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 - 文学批评史 - 研究 - 先秦时代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2935 号

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批评思想研究

著 者: 谭德兴

责任编辑: 许海意

封面设计: 程星涛

责任印制: 张道奇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5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5155 - 7

定 价: 13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此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批评思想研究（07BZW007）”
课题成果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甲骨卜辞与殷商时期的诗乐思想	31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看殷商时期的诗乐活动	31
第二节 从甲骨卜辞看殷商时期的诗乐思想	49
第二章 铜器铭文与周代文学批评思想之发展	70
第一节 中国文学批评思想之萌芽	70
第二节 周代铜器铭文中蕴含文学批评思想之范畴	100
第三节 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131
第三章 青铜乐器铭文与先秦诗乐思想的地域特色 ——兼论南北诗乐思想之互动	148
第一节 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思想	149
第二节 吴国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思想与季札观乐	160
第三节 南音北传与先秦诗乐思想之互动	173
第四章 商周铜器铭文之嬗变与文体思想之发展	191
第一节 时间叙事模式之嬗变	197
第二节 语言叙述模式之嬗变	203
第三节 商周铜器铭文文体类型及其文体思想	215
第五章 周代铜器铭文与《诗经》的文学批评思想	243
第一节 周代铜器铭文与《诗经》的字词、名物及史实	243

第二节 周代青铜乐器铭文与《诗经》的文学批评思想	273
第六章 楚竹简与战国文学批评思想之发展	293
第一节 《孔子诗论》的文学批评思想	293
第二节 郭店竹简与战国《诗》学批评	343
第三节 从《礼记·乐记》看战国文学批评思想之发展	364
结 语	381
参考文献	388

绪 言

一 选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

先秦文学批评乃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初始阶段。在先秦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多个文化发展高峰。传说中的三黄五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灿烂辉煌的文化，这些至今令无数中华子孙倍感自豪与骄傲。无论传说或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明，其中均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与后世的文学批评相比，先秦时期的文学批评思想在成熟性与系统性等方面略显不足，但这是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源头，它从范畴、理论以及批评方式等多方面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先秦文学批评思想的研究，理应包括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方面的研究。但由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实际上与科学系统的出土文献研究几乎同时展开，这无疑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方面出现滞后性。另外，由于存在对中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问题认识的分歧，以及在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理解上的不一致等原因，导致即使在出土文献研究无论从资料整理还是思想研究均取得巨大成绩之后，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研究仍然在吸收出土文献研究的成果方面表现得不够。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在先秦时期萌芽和发展，但由于传世文献不足，使得我们对先秦时期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具体状况认识不透彻，把握也并不全面。对有些问题，诸如中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的时间、地域以及某些诗乐批评观的传播和接受等，认知亦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从先秦出土文献中整理出文学批评思想无疑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20 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其中先秦时期的文献非常之多，主要有商代甲骨卜辞、殷周金文、战国楚竹简等等。这些地下新出材料中蕴含着

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而在 20 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虽然著述甚富,但几乎所有的著述皆建立在对传世文献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传世文献显然不能代表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全貌。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重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变得完全可能和十分必要。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目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最薄弱的环节。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充分利用出土文献。例如,关于中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的时间与标志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可谓众说纷纭,有“《易经》说”“《诗经》说”“百家争鸣说”“晋代说”等等,各说法中最早的萌芽时间与最晚的相差竟达一千三百余年。认识上的如此混乱无疑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之发展。而仅仅局限于传世文献显然已经无法解决此问题。事实上出土文献中有许多内容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认识此问题。例如,王孙诰钟铭文“自作稣钟,中翰且扬,元鸣孔隤,有严穆穆,敬事楚王”等语便显示出强烈的音乐批评观。类似的,在殷周金文中,一些批评范畴如“协和”“和乐”“敬德”“宽惠”“安乐”等频繁出现,这完全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评估中国文学批评观的起源问题。但很可惜,这些出土文献并没有引起文学批评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

先秦时期诗、乐、舞合一,文学批评观往往充分体现在音乐批评思想中。现有的文学批评史著述皆对此方面内容有所研究。如对《老子》“大音希声”、孔子的音乐思想、孟子“与民同乐”、荀子“乐论”、《吕氏春秋》音乐思想等等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无不停留在传世文献范围内,而事实上我们连先秦时期的具体音乐体制都没有完全弄清楚,使得这些讨论无疑呈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和主观臆测性。但出土文献却正在改变已往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结论。如 1976 年 2 月,在秦始皇封土西北约 100 米处出土一件错金钮钟,钟纽一侧刻有“乐府”二字,表明在秦朝就已建立了乐府机构。此物的出土彻底打破了汉武帝立乐府之说,不但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相关结论,而且可以帮助人们更深一步思考先秦采诗、献诗等文艺制度的可信性。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大批乐器,使得人们对先秦时期音乐制度的研究有了实物佐证,这不但弥补了先秦音乐理论研究的不足,而且引起了人们对南方楚国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重视。关于出土文献中音乐思想的研究工作其实早已展开,取得的成绩也是不俗的。如,唐兰先生《古乐器小记》探讨了先秦音乐的制式及一些基本范畴和理论;崔宪《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以楚国出土乐器为突破口探讨先秦音乐范畴与理论;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

综论》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分析、论证中国古代音乐制度与音乐理论等等。但这方面的研究仍未系统化，而且似乎没有完全从文学批评史的视角去审视这些出土文献。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相关研究也没有及时吸收这些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

关于甲骨卜辞与文学批评思想的研究，相关著述无疑是整个出土文献研究中相对较少的。这是因为，其一，卜辞的特点所决定。卜辞十分简短，且主要是占卜性质，这些无疑决定了难以从甲骨卜辞中发掘出成体系的文艺观。其二，卜辞的分期目前仍存在很大分歧，且殷商早期的卜辞也并不多见，因此，要从甲骨卜辞中梳理出一个文艺观的发展历程显然难度太大。再者，卜辞的释文工作仍存在较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其中文艺思想的探析。

目前出土的甲骨卜辞，主要包括殷商甲骨卜辞、西周甲骨卜辞（包括周原甲骨卜辞）。殷墟卜辞数量众多，研究著述也十分丰富，成为 20 世纪学术研究的重大主题。西周有没有甲骨刻辞？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人们很长时间。1940 年何天行在《学术》第一辑上发表了《陕西曾发见甲骨之推测》一文，首先对西周甲骨刻辞是否存在进行推断。但作为科学研究，关于西周甲骨刻辞研究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逐渐形成。代表著述如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 年）、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7 年）以及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 年）。周原甲骨卜辞，大体上也是殷周之际的产物，由于出土较晚，故研究著述并不多。这些甲骨文研究著述，基本都是关于历史、语言文字以及文化的研究。朱歧祥列出了甲骨文十项未来研究方向，其中竟没有一项是文学性质的。^① 基本不从文学视角研究甲骨文，更不用说研究其文艺思想了。不过，像西周甲骨这样有限的卜辞材料中也未必一定蕴含丰富的文艺思想。

关于殷商甲骨文的文学和文艺思想研究，一些学者做了积极而有益的开拓工作。例如，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多有把甲骨卜辞列入文学史考察视野的。1931 年郑振铎《中国文学史》、1932 年冯沅君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简编》、1935 年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等等，均将甲骨卜辞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写进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情况在 1949 年后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得到进

① 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7 年，第 1 页。

一步拓展。文学史研究甲骨卜辞，主要研究作为文学样式的卜辞所描写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以及甲骨卜辞的文体特征。例如，1957年，詹安泰、容庚、吴重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在引述了四十条卜辞后说：“这四十条的卜辞，虽然非常质朴，但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劳动人民的智慧与灵活运用语言文字的自由创造精神，就文学发展的过程说，这是必经的阶段。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它具有引导文学向前发展的一定的历史意义的。”^①但关于甲骨卜辞的文体性质，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甲骨卜辞是散文，例如，詹安泰、容庚、吴重翰《中国文学史》认为：“卜辞只是殷代自盘庚至帝辛时留下来的断烂的王室贞卜档案，是最朴素的散文形式，略具文学的雏形而已。”^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亦认为：“这些卜辞，可以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③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亦说：“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简短散文，可算是散文的萌芽。”^④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卜辞中亦有诗歌。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说：“这些文句，虽很简短，在语法上已建立了初步的规律，可以看出书面文学的初期形态，也就是后代韵文和散文的母胎。”^⑤刘大杰认为卜辞中“已具备朴素的诗歌形式”，这是后代韵文的源头。

除了文学史著述，研究甲骨卜辞文学以及文艺思想的单篇文章数量却不是很多。如，唐兰《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认为：“卜辞是一部分档案而不是纯粹文学，所以也不能代表商代文学。它有形式的拘束，所以在文学方面不能十分发展，但有许多极精美的句子，在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且可以证明商代的文学已十分发展，和周代相差不远。”^⑥姚孝遂《论甲骨刻辞文学》首先总结了前人关于甲骨卜辞文学性质的三种看法：“认为它是最朴素的散文形式，略具文学的雏形”；“它具有朴素的诗歌形式，有相当的写作技术，有韵脚、有节奏，是劳动音律的和谐”；“它不是文学作品”。紧接着

① 詹安泰、容庚、吴重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34页。

② 詹安泰、容庚、吴重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32页。

③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④ 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⑤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⑥ 唐兰：《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6年第3期，第701页。

该文讨论了甲骨刻辞中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甲骨刻辞文学作品举例以及甲骨刻辞中的神话传说资料。^① 曹兆兰《甲骨刻辞的形式美》认为：“甲骨刻辞的排列大多具有整齐、对称、错综之美，有重句复沓、类似序曲、正歌、副歌、尾声、联曲的多种组合形态。”^② 这是分析探讨甲骨刻辞的结构形态，可以视为一种文体研究。方建军《甲骨文、金文所见乐器助祭试探》分析了甲骨文中祭祀活动中乐器的使用情况，探讨了乐器演奏的娱神娱人、人神共乐和人神沟通的作用，^③ 不过该文对甲骨文所透露出殷商时期的诗乐观念并未作深入探究。真正称得上对甲骨刻辞中文艺观进行研究的，是徐正英《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该文“通过对带‘伐’‘舞’‘奏’‘文’等字的辞条的考察，我们发现商朝人确有浓厚的尚文意识；通过对孕育和记录‘占’‘谱’‘册’‘祝’‘诰’等古代文体雏形的刻辞的考辨，又发现商朝人亦具备了朦胧的文体意识；通过对甲骨刻辞字、句、篇的例释，还发现商朝人已具备了较明晰的写作意识”。^④ 该文对进一步研究甲骨刻辞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极富启迪意义。

关于先秦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研究，在本课题立项前和在研期间，学界相关研究论文一直不是太多。比较多的是从文学视角探讨商周铜器铭文，其中有些论述内容不同程度上涉及文学批评思想。关于金文文学思想内容之研究，开先河的无疑是王国维。王氏《两周金石文韵读》首先揭示了周代金文中存在韵文，为进一步研究金文文学思想特别是文体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王氏的研究对于省吾影响很大，其《双剑謠吉金文选》便极富文学批评色彩，如评《宗周钟铭》“渊奥宏朗，体势俊迈，惟诗书有此境界”，评《虢叔旅钟铭》“淫溢醇荡，气韵高逸”等等，诸如此类文学评论话语很多，可谓对金文文学特质感受颇深。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多有将商周金文纳入考察范围的，这些文学史著述主要研究先秦铜器铭文的思想内容，并对其散文文体特征作出初步判断（见第四章第三节论述）。再如，陈梦家说，“《大雅·韩奕》《崧高》等乃是王命的节录”，“《江汉》所载，变册命为韵文，当召伯虎时金文已有用韵语的；《常武》使尹氏宣王命，与金文同”。^⑤ 这已经

① 姚孝遂：《论甲骨刻辞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2期，第61～71页。

② 曹兆兰：《甲骨刻辞的形式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96页。

③ 方建军：《甲骨文、金文所见乐器助祭试探》，《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82页。

④ 徐正英：《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41页。

⑤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中华书局，2004年，第409页。

触及了周代诗文间互动关系问题，可惜没有深入展开。汤漳平《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据两周金文探讨了楚族的起源和两周楚国青铜器铭文中的楚诗，特别是对楚国金文中楚诗的研究颇有创新意义，但很遗憾没有将此研究观点推及整个周代金文中。其次，关于周代金文的文艺思想研究的论文不多。如徐正英《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功能观》，^①主要探讨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思想，包括对文学社会功能与审美娱乐功能分析，并认为“西周人认识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但该文认为西周铜器铭文对“美”的功能认识早于《诗经》“美刺”中的“美”，这个说法可能欠妥。因为《诗经》中《周颂》皆为赞美之诗，而《周颂》最先编辑并在周初已经用于诗乐实践，又怎可能比西周铜器铭文晚呢？还有，该文认为“西周人对文学的娱乐审美功能亦有了初步认识”，此言不差。但接着说“西周铜器铭文言及娱乐目的的内容还很少，共有八篇”，此言极不准确，该文考察的西周铜器铭文实质只有四篇，西周铜器铭文言及娱神或娱人目的的铭文远远不止作者所说的这几篇。且两周铭文中对诗乐功能的认识在春秋以及战国时期表现仍然十分强烈，这点作者就没有后续研究了。又如，黄鸣《从先秦乐器铭文看先秦儒家乐论之嬗变》，^②该文对西周春秋战国乐器铭文都有所论述，论西周乐器铭文中的娱神、娱乐论，却没有涉及娱人目的。且作者将“天尹作元弄”之“弄”释为“玩赏”从而得出西周乐论有娱乐论，这种解释很值得商榷。该文为了印证传世文献所谓春秋“郑、卫之声”而强行将春秋战国青铜乐器铭文体现的音乐思想定为“世俗化”。正如作者自己文中所说，“郑、卫之声”为“民间新声”，其又怎可能与上层统治贵族乐器铭文同质呢？另，不知是作者资料占有不够，还是有意为之，在论述春秋战国乐器铭文时只取娱人内容，便说此时音乐思想为“世俗化”，事实上，春秋战国青铜乐器铭文表达的仍然是雅乐正乐诗乐观，与西周并无多大区别。例如春秋晚期齐鲍氏钟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齐鲍氏孙□择其吉金自作和钟卑鸣攸好用享以孝于岱皇祖文考用宴用喜用乐嘉宾及我朋友子子孙孙永保鼓之。”^③此铭中，“用享以孝于以皇祖文考”属于娱神，而“用宴用喜用乐嘉宾及我朋友”则属于乐人。与西周时期青铜乐器

① 徐正英：《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功能观》，《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② 黄鸣：《从先秦乐器铭文看先秦儒家乐论之嬗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③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铭文相比较,此铭娱神、娱人的基本内容及话语形式并无多大不同。再如,陈彦辉发表过系列关于先秦铜器铭文文体研究的文章,如《商周青铜铭文体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西周册命铭文的礼仪内涵及其文体意义——以文体要素“拜手稽首”为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周代铭文祝嘏辞的文体特征》(《学术交流》2011年第12期)等。这些文章虽然探讨了先秦铜器铭文文体特征,但却没有涉及商周铜器铭文所体现出来的当时人们的文体思想。当前,先秦金文研究正朝文学领域推进。近年来,已有多项关于先秦金文文学研究的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对文学批评思想领域的研究却仍然亟待拓展。

关于经籍的批评无疑属于较典型的文学批评思想。出土文献这方面的材料主要集中在楚简中。如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中有关于《诗》《书》《易》《礼》《乐》《春秋》的引用与评论,许多批评术语是传世文献所没有的。而上博简的诗论材料则相当丰富,如上博简一的《孔子诗论》等,无论从批评范畴还是批评理论,都大大丰富了先秦文学批评思想的内容。关于楚简研究的著述相当多,仅郭店楚简研究的论著就有几十部,论文近800篇(含硕、博论文),研究者遍布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等地。而关于上博竹简的研究著述也不少,论文也已达400余篇(据CNKI知网),而且正逐月不断在增加。但这些著述绝大部分是从文字、训诂以及历史、文化等视角出发的研究成果,真正从文学批评视角展开研究的专著并不多,论文近年开始有所增加,但显然在系统性方面有待加强。

郭店楚简研究著述与文学批评相关的主要集中在《性自命出》等篇,现略述之。首先是对“性”“情”范畴之辨析。“性”“情”或“情性”范畴,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思想中的核心范畴,因此,无论是哲学层面之探讨还是文学批评层面之辨析,无疑都具有浓郁的文学批评色彩。例如,向世陵《郭店竹简“性”“情”说》,^①“重点围绕物之动性、悦之逢性、故之交性、义之厉性、势之出性、习之养性、道之长性等七个性情发展阶段和类型”,对“性情”范畴进行辨析。该文虽然是从哲学层面对性情范畴的探讨,但性情范畴在战国竹简中已经演变成为诗学批评范畴,且在两汉时期成为诗学批评核心范畴,故该文探讨有助于文学批评视角对性情范畴之研究。汤一介《道始于

^① 向世陵:《郭店竹简“性”“情”说》,《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

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①重点分析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道始于情，情生于性”，辨析道、情、性、欲之关系，对文学批评范畴研究具有启迪意义。类似的，东方朔《〈性自命出〉篇的心性观念初探》探讨分析了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中情、性、心范畴的内涵与联系，也具有文学批评研究之色彩。而陈昭瑛《性情中人：试从楚文化论〈郭店楚简性情篇〉》也是如此，“尝试从楚文化的脉络，探索《郭店楚简》重情、重身的思想倾向与楚人特殊的精神特质、审美意识、生活礼俗之间的可能联系”。^②其次，探讨郭店竹简中的乐论与乐教。这方面的著述比较多。例如，丁四新《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通过对《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思想的细致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礼记·乐记》的心性论内涵是颇为深刻丰富的。《乐记》中有关心性的论述，尤其是有关道与欲、天理与人欲的理解，以及以“正义”论身心关系，都比《性自命出》更深入、更高阔。结合其他有关传世文献的考察，似难推定《性自命出》为公孙尼子所作”。^③饶宗颐《从郭店楚简谈古代乐教》，^④主要结合《礼记》等传世文献以及出土青铜乐器等，从郭店竹简中梳理出了一些表现乐教的范畴与话语，揭示了战国时期的乐教思想内涵。蔡仲德《郭店楚简儒家乐论试探》，^⑤主要从“论乐与人的关系，论乐对人的教德养心功用”“论由礼至乐的递进关系”“论乐与礼的相辅相成、相反相济”“论乐之制作”等方面，探讨了《性自命出》中的儒家乐论，认为“郭店楚简中的儒家乐论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强调音乐教德养心得作用，强调礼乐配合治人治国的功用，反映了儒家乐论共有特征；这些乐论在儒家乐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就所论及的方面而言，其思想是孔孟思想的发挥与补充，但不如《中庸》《荀子乐论》《乐记》《孔子闲居》那样深入”。家浚《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乐记〉》从“感于物而动说”“乐情说”“移风易俗说”“礼、乐同异说”“乐之雅、俗说”等方面，比较了《性自命出》与《乐记》异同，认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今传《乐记》有许多联

① 汤一介：《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

② 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4页。

③ 丁四新：《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④ 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⑤ 蔡仲德：《郭店楚简儒家乐论试探》，《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

系,但它不是《乐记》赖以发展的基础,更不是其原始版本”。^①孙星群《〈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力证——以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为据》,^②将《性自命出》的话语及性、情、德、道、礼乐等范畴与《礼记·乐记》比照,从而得出《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结论。孟修祥《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之音乐美学论》论述了《性自命出》的音乐之起源、音乐之功能、音乐之宗旨等方面内容,认为《性自命出》与《乐记》等经典著作表现出既有相同,也有相异之处的音乐美学观念。^③梁惠敏《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与〈乐记〉乐论比较谈》认为,“《性自命出》论及音乐的起源,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音乐对人的性格和道德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等,与《乐记》所表现出的音乐美学思想有其一致性,也有其相异性”。^④鹿建柱《论〈性自命出〉的乐教内涵》主要从三方面分析《性自命出》的乐教内涵:“其一,《性自命出》的乐教建立在具有性善论倾向的人性论基础上;其二,《性自命出》的音乐思想既重学又重教;其三,《性自命出》的乐教突出了情的重要作用。”^⑤再次,探讨郭店竹简中的诗学理论。例如,饶宗颐《诗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简资料为中心》,结合大量传世文献,对郭店竹简《语丛》《性自命出》等篇中关于“诗”和“志”的话语进行辨析,对“诗言志”命题重新进行探讨,认为“《诗》之为书,为篇章的总集,正荟萃着古今人的‘志’之所托。‘诗以道志’即所以见古今之志。通过这些诗,可以使民变化气质。儒家对诗的功用,从断章零简的语言,略可捉摸到古人立言的大体”。^⑥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⑦第六章“从出土楚简看‘诗言志’命题在先秦的发展”对“诗言志”在楚简中的表现作了细致分析,颇有创获。

还有一些关于郭店竹简的研究文章,也或多或少与文学批评思想研究相

① 家浚:《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乐记〉》,《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1年第2期。

② 孙星群:《〈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力证——以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为据》,《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5年第3期。

③ 孟修祥:《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之音乐美学论》,《管子学刊》2006年第3期。

④ 梁惠敏:《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与〈乐记〉乐论比较谈》,《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⑤ 鹿建柱:《论〈性自命出〉的乐教内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⑥ 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页。

⑦ 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关。如王博《帛书〈五行〉与先秦儒家〈诗〉学》，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六经次序探源》《郭店楚简引〈书〉、论〈书〉考》《郭店楚简与〈诗经〉》，龚建平《郭店楚简中的儒家礼乐思想述略》，萧汉明《论庄生的性命说与道性二重观》，尹振环《楚简〈老子〉“绝智弃辩”思想及其发展演变》等，这些文章主要以考证和学术思想研究为主，对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我们这里就不再一一述评了。

上博简研究著述与文学批评相关的主要集中在《孔子诗论》等篇什，而且近十年的探讨比较热烈。如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以及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辑的论文集《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及其续编中的部分论文等等，这些研究著述在上博简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关于《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研究无疑属于典型的文学批评研究。在本课题在研的这几年时间中，学界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著述，有必要重点进行梳理和述评。近年来，《孔子诗论》诗学思想研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讨《孔子诗论》中蕴含的诗学思想。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探讨了《孔子诗论》中的教化观、诗言志、性情观、思无邪以及兴观群怨等实用主义功利观。例如，方铭《〈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①认为《孔子诗论》与《诗序》是一致的，并据此探讨孔子对文学创作根本目的和终极目的之阐述。刘冬颖《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②据《孔子诗论》解诗认定，“风雅正变”说为后儒附会而传统“美刺”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作者论点表面看颇为新颖，但却经不起推敲。因为《孔子诗论》解的只是《诗经》中部分诗篇，根本不是全部系统的解说，怎能轻易否定古人的《诗》学理论？那么今本《诗经》中如此大量的赞美与讽刺诗篇又作何解？张明华《〈孔子诗论〉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之比较》，^③该文认为《孔子诗论》与《左传》《国语》的诗学观有三个相同点：“对诗的本质的认识和对风、雅、颂的认识是一致的；都采用‘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乃至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解释也是一致的”；又有三个不同点：“点滴论述和自成体

① 方铭：《〈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刘冬颖：《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

③ 张明华：《〈孔子诗论〉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之比较》，《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

系的不同；断章取义和评论篇旨的不同；大、小雅并重和国风、小雅并重的不同”。朱中明《〈孔子诗论〉的原创性诗学观》，认为《孔子诗论》的原创性诗学观具体表现在“诗亡隐志”论、就《诗》论《诗》文本还原阐释模式、崇尚“德”与“知（智）”的审美价值取向。^①但该文中有有些论断显然是作者对材料占有不够才形成的问题。如文中说“诗言志”是从创作者角度立论，“诗亡隐志”既是从创作者也是从接受者角度立论，故有原创性。其实，朱自清《诗言志辨》早就论述过“诗言志”包括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因此，“诗亡隐志”是对西周至春秋诗学实践的总结，是对“诗言志”说在诗、志关系上的拓展，谈不上绝对的原创性。作者认为崇尚德、智的审美价值取向属于原创性，事实上，郭店竹简中以德、仁、义、礼、智、圣论诗十分普遍，到底哪个是原创呢？吴福秀《从上博简〈诗论〉探“诗言志”说》^②认为，上博简《诗论》“诗亡隐（离）志，乐亡隐（离）情”是对《尚书》“诗言志，歌永言”的发展，并且在“情”“志”的理解上有融为一体的倾向。

廖群《“乐亡（毋）离情”：〈孔子诗论〉“歌言情”说》，^③对《孔子诗论》中孔子如何理解情歌作了初步分析，文章篇幅短小，论述情的类型和涉及的材料范畴都不丰富。张丽丰《〈孔子诗论〉与性情学说》，^④该文试图论述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与《孔子诗论》之间的学术关系，但全文只论述了《性自命出》和《性情论》的部分性情范畴，根本没有涉及《孔子诗论》性情学说之分析。而作者《试析〈孔子诗论〉以情论诗》^⑤一文倒是分析了《孔子诗论》中以情论诗的部分材料，但篇幅太短，论述既不系统也欠深入。

毛宣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诗论的解释学意味》，^⑥从解释学分析孔子诗学目的在于“以形象譬喻引发义理，求得作者与读者用心之相通，并通过学诗来提升人的精神，以达到礼义教化和人格培

① 朱中明：《〈孔子诗论〉的原创性诗学观》，《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② 吴福秀：《从上博简〈诗论〉探“诗言志”说》，《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③ 廖群：《“乐亡（毋）离情”：〈孔子诗论〉“歌言情”说》，《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④ 张丽丰：《〈孔子诗论〉与性情学说》，《文化研究》2009年5月（上旬刊）。

⑤ 张丽丰：《试析〈孔子诗论〉以情论诗》，《文史》2010.03（中旬刊）。

⑥ 毛宣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诗论的解释学意味》，《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